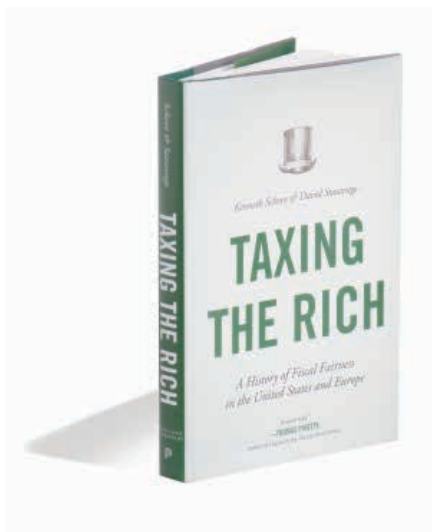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劫富济贫



肯尼思·席夫、大卫·斯塔萨维奇  
向富人征税

美国和欧洲的财政公平历史

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，新泽西州普林斯顿，2016年，288页，29.95美元（精装）。

在参观20世纪30年代萧条的威尔士村庄的时候，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：“必须采取措施”。如今令人困扰的不平等加剧让人有相同的感觉。要采取什么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提高累进税率？本书明确给出了回答：最好不要。

这只是作者高见的一个方面：关于是什么推动累进税制的独特理论。为了得出答案，作者首先排除了另外的两种解释。其一，累进税是支付能力理论的应用：富人应该向国家缴纳重税，因为缴纳重税对他们来说损害较低。但是，作者证明，税前收入的严重不平等并不会产生高额的最高税率。其二，累进税率增加是由于选举权扩大，占到多数的穷人投票要求从少数富人那里夺得财富。但作者认为这种理论也不成立。

剩下的就是“补偿”理论——累进个人税制在以下时期使用，在民

主国家引发根本性不公平且不能经由其他手段消除之时，或者在“政府的政策向富人阶层倾斜”之时。

这种不公平有几种呈现形式，如出于收入考虑需要税基广泛的商品税。但他们的中心论点是，导致不公平最重要的来源是战争时期的大规模动员。美国内战就是一个案例，当时大量征税，到处充斥着一种情绪，认为这是一场“富人的战争，却要靠穷人去战斗”。于是，双方引进了累进收入所得税。（这种联邦所得税很快被取消，进一步证实了补偿理论：一旦根本性不公平削弱，累进制也就退居二线。）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两次世界大战，书中进行了详细阐述。但是世界已经变了，战争技术更发生了彻底变革。如今已经不再是与大规模军队作战，而主要是高科技作战，这让作者怀疑，将来是否还会出现像20世纪那样的累进税制高峰。

本书是一个方法论模型。作者采用一系列方法阐述论点：计量经济学、实验室实验、文本分析和历史故事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收集的数据集（作者分析方法的核心），包含了20个国家1800—2013年这200多年间的最高所得税和遗产税率。

肯尼思·席夫（Kenneth Scheve）和大卫·斯塔萨维奇（David Stasavage）引发了我们的思考。例如，大规模动员没有推动累进税制和遗产税的矛盾情况也确实存在。一个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，作者认为，当时征收了其他累进税。另一个特例是以色列，在1967年战争前后7年中，最高所得税税率（也与强制贷款有关）增长了10个百分点，但是最低所得税税率增长了12个百分点。相反，没有大规模动员的情况下累进制也会增长：作者把“一战”期间未卷入战争的民主国家作为论据，对反

例进行系统性判定和分析，这有助于增强补偿理论的信服力并了解该理论可能存在的局限性。

## 战时大规模动员推动累进制所得税。

然而，也许这本书为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课题，就是揭示国家造成的不公平这一深层理念。虽然在已经公开的披露中，补偿理论的重要性和说服力足以令人信服。但是怎样能让这些理论进一步升华，以影响政策呢？以“一战”为例，英国军官级别的死亡率远高于出身贫寒的普通士兵。难道是富人战时因为不想失去很多而情愿作出巨大牺牲（“富人的战争”）？那么，为何在过去几年，他们怨恨紧急援助和紧缩政策，却至今也未造成累进制税率上涨？

作者清晰地展示了补偿理论的说服力。从2016年美国大选初选来看，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印证，证明了体制向富人阶层倾斜，同时政治策略家也留意到了补偿理论。

迈克尔·基恩  
(Michael Keen)  
IMF财政事务部副主任